

回顧 | 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在香港中文大學圓滿舉辦

語言學冰室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第四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於2018年6月15至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本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山大學在2015年發起，自2017年開始加入復旦大學，並由這三所學府輪流主辦，作為促進方言語法比較研究的平台，著重粵語、吳語等東南方言的比較研究，推動跨地區研究，並加強學術交流和對話。前三屆論壇分別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舉辦，本屆又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由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辦，並得到了中大聯合書院的贊助。

經過前三屆論壇的嘗試性探索，本屆論壇首次採取公開徵稿形式，響應者眾，來稿甚豐，匯集了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星海音樂學院、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按音序）的語言學學者。

會議伊始，鄧思穎教授主持開幕並致辭。鄧教授提到，“方言語法博學論壇”以“博學”為宗旨，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復旦大學三校校訓都有“博學”二字，並兼具“博學”之旨。此外，“博學”也象徵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的一個方向，既著重跨方言比較，又鼓勵理論多元化，開闊視野。從本屆開始，論壇設定專題，使討論的話題更為集中，學術交流的效果更佳。

本次論壇的報告覆蓋了粵語、客語、閩語、吳語、贛語、西南官話等方言，圍繞著名詞結構與其有定性、指稱性等語法語義特徵展開討論，尤其是“量名”結構與有定（或稱“定指”，以下一律稱為“有定”）的關係。

復旦大學盛益民教授，探討浙北吳語量詞結構（包括“量名”結構與量詞獨用）的無定表達現象，認為“量名”結構表無定具有強制性，不能替換為“一量名”結構，二者互補分佈，並由此討論了漢語方言指稱系統的創新及其類型學意義。

上海大學林素娥教授，從傳教士上海話課本中“一+量（N）”對應英語、法語定冠詞的現象出發，考察了早期上海話的“一+量（N）”結構從無定到有定的轉變，以及定指“一+量（N）”結構的限制條件。

中山大學黃燕旋研究員，調查了潮汕方言中的“指量名”結構，並以變調形式的不同，將其分為兩類：前變調 A 式、後變調 B 式。並認為 A 式為原生用法，B 式是有標記的衍生用法，附加了對比意義。

中山大學徐曉嫻同學，考察了潮汕閩語的有定“量名”結構，這種“量名”結構在主賓語位置都可有無定或有定的理解，是一種不論遠近的中性指示。且變調與不變調的形式分別具有 [+區別性] 與 [-區別性] 之別。

香港中文大學金佳同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張慶文教授，討論了澄海話的“量名”短語，該結構在部分介賓結構中和控制句中充當賓語時可以有有定和無定兩種解讀。她們認為，當量名短語是受影響者或控制語時，更容易在賓語位置上獲得有定解讀。

台灣清華大學陳伊凡同學，考察了陸豐坎石潭軍話中的源自粵語、客語、閩語的詞彙借用情況，如：“棵、𩚑、和”等詞。

香港教育大學胡小娟同學和錢志安教授，探討了贛語蓮花話名詞短語的中用來表達有定的“個 + 名”結構。“個”相當於定冠詞的指示功能，指稱性上，除了有定，還可以標誌類指、標記話題，並認為“個 + 名”來源於“中性指示詞 [ku13] + 個 + 名”的省略。

復旦大學陳秋實同學與盛益民教授，討論了西南官話石柱方言“名數量”結構的指稱屬性與句法功能，認為“名數量”結構表有定，其中“數”不過“三”，部分名詞後不能省略“數”，整個結構具有很強的話題性。

香港中文大學劉擇明同學，考察了香港粵語“量名”結構在賓語位置時有定和無定分佈。動詞加上不同後綴，會改變有定無定解讀的合法性。其中動詞後綴“咗、緊”後面的“量名”結構有定無定解讀都可以接受；跟次數、機率有關的後綴“吓、硬”後面的短語只作有定解讀；與數量有關的“翻 2、得、啖”則只作無定解讀。

上海交通大學金大衛老師和陳煌煌同學，對溫州吳語中名詞短語後“ŋi”的分佈展開討論，根據其拒絕窮盡性焦點、拒絕對比性話題、拒絕極大值、標記條件從句而拒絕原因從句四個特點，認為溫州話“ŋi”是一個對比話題標記。

中山大學盧笑予研究員，從類型學角度看臨海方言的“個”（ke）和“咽”（kəʔ），並以朱德熙先生對普通話“的”的分類為基礎，結合台州話、吳語、閩語等方言材料，探討臨海方言中結構助詞“個”和“咽”在語音和句法上的分佈和交叉。

星海音樂學院石佩璇老師，調查了粵東九個縣客家話的領屬人稱代詞，考察其領格形式與主格形式的使用和分佈，探索粵東客話領屬關係的編碼狀況。而這種豐富的人稱代詞表達也體現了客家族群對親屬關係的重視。

中山大學劉玲同學，調查了廣西貴港客家方言中表有定的“量名”結構及其語法分佈。並從語法化的角度，認為貴港的“量名”可能不是從早期粵語發展而來，應是同壯語或粵語“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導致的“構式複製”。

中山大學蔡芳同學，討論了江西安遠（鶴子）客家方言的領屬結構以及領屬標記[a35]的領有分佈狀況，認為[a35]的本字為“家”，經歷了語音弱化，從“家”義處所後置詞語法化為准領屬定語標記。且在語法化過程中沒有經過“複數標記”階段。

北京大學郝琦同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徐毅發同學，考察了粵語和普通話中的“（一）量名”結構與有定、特指和非特指的對立。並指出“一”的刪除源於在信息結構中“weak-strong”的對立，而不是在語義解讀上的對立，應該是信息結構帶來的語音層面的要求。

復旦大學陳嘉晉同學，以現代香港粵語網絡小說《西營盤》的敘述文本為語料來源，用語篇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粵語量詞的指稱功能。認為“量名”結構表達背景信息，而“一量名”結構表達前景信息。

中山大學林華勇教授和蔡黎雯同學，對廣州粵語等的“量名”結構進行了描寫、比較與分析，初步提出漢語方言的“量名”結構是一種語用“使用模式”（use pattern）；“量名”表有定是量詞顯赫語言的可能選項，但不是必然選項。

各位講者報告之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郭必之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張欽良教授以及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李寶倫教授主持評論，並與各位講者聽者展開了妙趣橫生的討論。

最後，鄧思穎教授宣佈第五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將於2019年6月中下旬在中山大學舉行，延續本屆公開徵稿的形式，以“言說類動詞”為主題，歡迎大家來稿。

撰文：風駿

（轉載自2018年6月22日微信公眾號「語言學冰室」文章）